

学习夏鼐1941年的讲演稿： 《考古学方法论》

王 兴

关键词：夏鼐 《考古学方法论》 科学考古学 古代社会

KEYWORDS: Xia Nai *The Archaeological Methodology* Scientific Archaeology
Ancient Societies

ABSTRACT: Dr. Xia Nai's Speech Script *The Archaeological Methodology* which was made in 1941 possesses positive meanings of enrich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the Chinese archaeology just started for a short time. Seen from the content of the speech, some conclusions of Xia Nai had clear prospects. This speech had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rmation of Xia Nai's archaeological theoretical system in the later times. This speech mentioned the field archaeological methods,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a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the statuses of archae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the expectations to the Chinese archaeology, etc., all which are significantly meaningful for the studies on the archaeological thoughts of Dr. Xia Nai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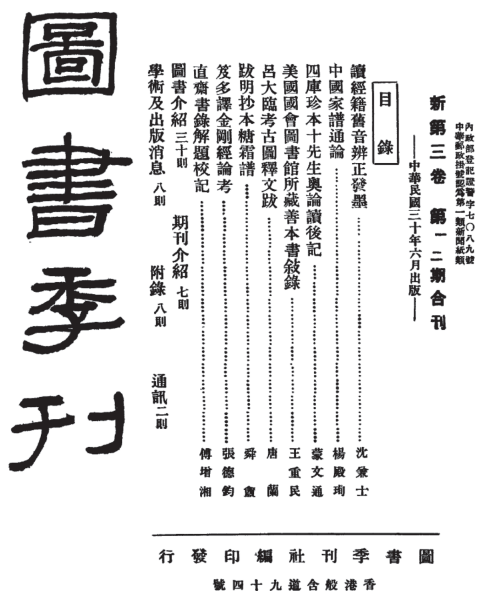
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对新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笔者在阅读《夏鼐日记》^[1]时，发现他在1941年回国之初，曾于2月21日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以“考古学方法论”为题作了一次学术讲演。经进一步查证，发现此篇讲演稿事后刊载于1941年6月出版的《图书季刊》新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中（图一；图二）。此文献在过去出版的《夏鼐文集》^[2]、《夏鼐集》^[3]中均未收入，有关夏鼐著作系年目录也未见录入^[4]。根据笔者提供的线索，新近出版的增订重编版《夏鼐文集》^[5]已收入该篇讲演稿。因涉及田野考古方法、考古学与历史学之关系、国内外考古学现状、对中国考古学的期待等重

要问题，有必要对夏鼐这次讲演的缘由、内容及学术价值做相应的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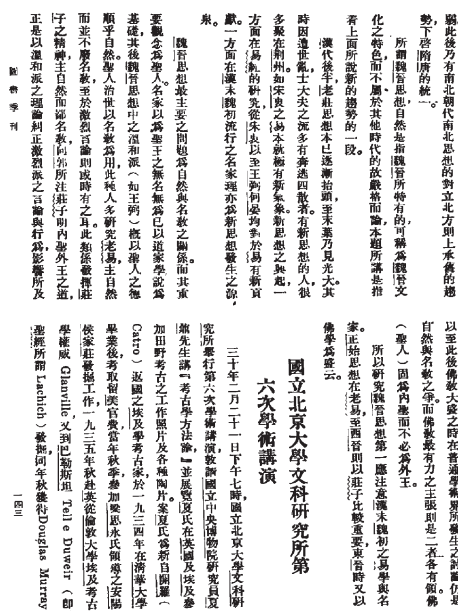
一、学术讲演的缘起

1941年1月，夏鼐返回阔别五年半的祖国，24日抵达云南边境畹町，2月3日抵达昆明。不久，罗常培（字莘田）约请夏鼐作学术讲演，《夏鼐日记》于当年2月18日记“在罗莘田先生处闲谈，罗先生替北大文科研究所约我讲演”。2月20日，《中央日报》（昆明版）已登出夏鼐公开演讲的通告（第四版第四栏），夏鼐并将“通告”抄入当日的日记之中。2月21日，“上午有警报，与罗莘田先生同赴北山疏散，在防空壕中起草讲演稿。下午4时半解除警报……晚间7时在

作者：王兴，北京市，100875，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图一 《图书季刊》封面书影



图二 《图书季刊》正文书影

昆北食堂讲演，听者约百余人，罗莘田先生主席，致介绍辞”。2月23日，夏鼐“抄录前日之讲演稿，以罗先生拟将此交与《图书季刊》发表也”，晚间“客散后，续抄讲演稿，至夜深1时始睡”。2月24日，“将讲演稿整理后，交与罗莘田先生”。

此次讲演，可以说是夏鼐回国后的第一次学术“亮相”，他有机会将自己多年所学的知识以及积累的田野考古经验讲给听众。“在防空壕中起草讲演稿”、“续抄讲演稿，至夜深1时始睡”，说明他极为重视这次讲演。“考古学方法论”的讲演稿，后来发表于1941年6月出版的《图书季刊》新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上。在这篇讲演稿之前，有一段编者的话：“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举行第六次学术讲演，敦请国立中央博物院研究员夏鼐先生讲‘考古学方法论’，并展览夏氏在英国及埃及参加田野考古之工作照片及各种陶片。……是日虽在空袭，警报后，听众仍极踊跃。兹录夏氏讲演稿如下”（见图

二），简要介绍了此次讲演举办的情形。因该期刊物的目录中只标示出“学术及出版消息八则”，并未列出“考古学方法论”的讲演题目，也未列出“夏鼐”的署名（见图一），并且目录与正文内容有所出入，实际上该期刊物共有“学术出版消息”九则，而夏鼐的讲演恰好为“第九则”，这可能是日后学界未注意到此篇讲演稿的原因。1958年12月13日罗常培逝世，夏鼐于15日的日记中记载“先辈学者又弱一人。我是1941年2月返国途经昆明时第一次晤面，那时他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负责，邀我在所中作一次公开讲演（1941年2月21日）。那天恰巧有警报，与罗先生一起躲警报，后来讲演即由他作主席。又因为罗先生的督促，讲演稿整理后交《图书季刊》发表，那时《季刊》的编辑之一张静女士即罗先生的干女儿，觉得罗先生是很热情的精力充沛的一个人”。这段回忆反映了夏鼐对罗常培去世的哀悼之情，还说明当年罗常培促成的这次学术演讲在夏鼐心中的重视程度，以至他在十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需要提及的是，夏鼐讲演的“考古学方法论”作为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第六次学术讲演。在此之前，1940年10月12日、11月16日，第三、四次学术讲演举办（向达讲演“敦煌学导论”）；1941年2月3日，第五次学术讲演举办（汤用彤讲演“魏晋思想之发展”）。抗日战争期间，许多高校虽迁居内地，但他们克服诸多困难，持续举办了很多讲演，为师生带来学术上的“盛宴”。夏鼐讲演当天，虽有空袭，但警报结束后，仍在晚间进行讲演，“听者约百余人”。因此夏鼐的这篇讲演稿，作为一份珍贵“历史资料”，亦是“国难”时期众多学人努力传播知识文化的“缩影”，这一点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与铭记。

二、为何以“考古学方法论”为演讲主题

夏鼐之所以选择考古学的“方法论”作为演讲主题，首先源自他对“科学考古学”的“方法”的强调及重视。

1935年3~6月，夏鼐在梁思永主持的殷墟发掘团中进行考古实习，期间他在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陵区东部，还参与发掘了几座小墓和车马坑。5月31日安阳实习将要结束之时，夏鼐在日记中认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颇不少，可惜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故常失了重要的枢纽”。这是他明确强调“科学式发掘方法”的开始。1929年，负责安阳殷墟首次发掘的董作宾曾认为他们的工作是以“科学方法发掘之”为特色^[6]。然而李济并不认同此说，李济后来评价说：“因系河南人而有天才又易于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到安阳的董作宾，对现代考古学都没有任何实践经验”^[7]。考古新人夏鼐仅在几个月的考古实习之后便有同感，说明他的眼光还是非常敏锐的。他对“科学式发掘方法”的强调，也是对“科学的考古学”的强调，他的这些看法显然与董作宾等人的看法有所不同。

1935年8月7日，夏鼐离开上海，乘邮船赴英国留学。10月，他在伦敦大学考陶尔德研究所注册，师从叶慈（Yetts）学习“中国考古与艺术史”。但是没过多久，他觉得在英国学习中国考古学是一个错误的选择^[8]，于是在1936年4月写长信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详细陈述自己准备改学埃及考古学以及申请延长留学年限一年的缘由。在信中提到：“盖生今年所学者，多为田野工作之技术。但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尚未暇顾及。故进一步观其如何就各种古物，依其形制，以探求其发展过程，如何探求其相邻文化交互影响之迹，由古物以证古史，以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凡此种种研究方法，并非听讲空论原则，即可学得，而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故欲达此目的，必须先对于其历史、宗教、文字，一切皆有相当知识”^[9]。可以说，夏鼐对考古学的认识逐渐深入，“如何就各种古物，依其形制，以探求其发展过程”、“如何探求其相邻文化交互影响之迹”，并且“由古物以证古史”，这些是“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的方法。若参以“具体之实物及实例”，才能“领悟”这些方法。想要达到这些目的，又“必须先对于其历史、宗教、文字，一切皆有相当知识”，表明掌握历史、宗教、文字等知识对于从事考古事业的重要性。

夏鼐于安阳实习将要结束之时，惋惜当时中国考古学上的材料都是未经“科学式发掘方法”，这恰与他留学期间希望“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的想法相呼应。要在中国“建设一科学的考古学”，采用何种“方法”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考古活动之后，随着殷墟考古工作的进行，当时中国的考古学开始重视田野发掘，并逐渐运用地层学及类型学等方法，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人十分提倡及重视在考古发掘

中运用科学方法。傅斯年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就强调“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之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10]，李济也认为“一切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的训练可以帮助“现代考古家”在发掘时“求一个全体的知识”，而“只知道记载什么，不知道如何记载，不特劳而无功，终算不了科学的考古”^[11]。然而在夏鼐看来，当时兴起及被时人所实践的考古学，是否符合“科学的考古学”的标准尚需考虑。当然，夏鼐心中所谓“科学的考古学”的标准，也会随着他认识的深入、考古实践经验的积累而有所变化。

在致信梅贻琦的同时，夏鼐也曾就相关问题写信咨询过傅斯年。傅斯年的复信中提到“中国考古学之发达”须有“史前学”、“埃及学”、“亚述学”、“古典考古学”等“专科之研究者”，并且各研究者“各走一路，合为大成”，才是中国考古学发达的关键。这些在外国学习的“专科”，“在中国虽不能直接应用，然意解与方法，皆可取资”。他还向夏鼐指出，“埃及学未如古代西方亚洲考古之与中国考古发生直接关系，然其意解与方法，可资取证者多矣”^[12]。傅斯年颇为赞成夏鼐改学埃及考古学。与中国考古学相比，外国的“专科”自然有很多的不同，但傅斯年更加强调的是借鉴外国的“意解与方法”，由此而发展中国的考古学。学习并掌握外国的“意解与方法”，也成为夏鼐留学期间努力的方向。

1937年6月20日，夏鼐在日记中评价同在英国留学的吴金鼎的论文《中国史前陶器》，“用力颇勤，而所得并不多，结论之年代比较，更多悬空忖想，不着实际。就目前之智识而论，于豫、鲁、晋三省之史前遗址，作比较研究，尚可得一暂时可用之结

论；陕西材料太少，且未发表；东三省及甘肃之遗址，强拉到一起，徒显露科学训练之缺乏而已”。显然，夏鼐对吴文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科学训练之缺乏”^[13]。联系到此前夏鼐一再强调的“科学式发掘方法”、“科学的考古学”，说明他对于现代考古学中科学的方法的重视。此处又再一次强调考古学中“科学训练”的重要性。所谓的“科学训练”，大体上指在田野考古的过程中学习并有效运用正确的、先进的考古学方法，并最终将考古材料展现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因此考古发掘关键不是看挖出了什么，而是看用什么方法挖出来的。当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不久，国内考古学者对于科学的发掘经验不多，他们也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逐渐地熟练了发掘方法。

1936年暑期，夏鼐随惠勒（Wheeler）在多切斯特附近的梅登堡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实习结束回到伦敦后，曾与吴金鼎讨论目前国内考古现状。9月14日，他和吴金鼎“畅谈国内考古学界情形”。吴金鼎谈到，他同意卫聚贤的“中研院发掘前无计划，发掘后无报告，报告无内容”的说法，夏鼐“以为未免言之过甚，中研院考古组开始时，即有计划，惟非考古计划，不过欲掘有字甲骨而已，后来改组，然受影响不少，小屯的发掘，最难令人满意者以此”。夏鼐因从事小屯发掘的人更加关注“有字甲骨”而表现出自己对小屯发掘的“不满”^[14]。虽然傅斯年、李济等人重视瓦片兽骨等无文字之遗物，但在夏鼐看来“欲掘有字甲骨”的观念还是影响了后来小屯的发掘。1937年6月6日，夏鼐在与友人的聚餐中又谈到了“国内考古界情形”，他“以为五年中吾人应提倡发掘，今日则应禁止乱掘，让未受训练的人大规模地乱掘，为害较乡人盗掘更甚”，反映出他对当时国内考古发掘状况的忧虑。事实上，从1928年10月到1932年12月

的七次安阳发掘中，小屯被选为工作中心的主要原因在于这里曾出土过有字甲骨^[15]。对于亲历殷墟发掘且已接受一些近代考古学专门训练的夏鼐而言，他亲身体会到国内考古观念以及考古技术、方法的落后，也使他更强烈地感到中国考古学需要在科学方法上加以提高的重要性。

梳理出夏鼐从安阳考古实习开始对“科学的考古学”的多次强调，便可以明确何以夏鼐1941年回国后的首次学术讲演就以“考古学方法论”为主题的原因了。在演讲中，夏鼐对皮特里（Petrie）考古发掘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皮特里发掘塔尼斯遗址时，对前人的考古发掘方法大加改进，“谨慎周密，堪称为科学的发掘方法”。其他如“欧洲之考古学家，常能于发掘完竣后一年以内草就报告”这类细节问题，夏鼐认为都是可以“取法”的。总之，夏鼐希望中国考古学能够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考古学观念和方

法，使中国考古学得到迅速发展。从1950年开始就职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夏鼐依然非常重视科学的考古学方法。1951年4月13日，夏鼐参加河南省文管会召开的文教界座谈会，“略谈国家之重视考古学，及考古学之任务与新观点和新方法”。1952年夏鼐在北京大学为第一届考古训练班讲授“田野考古序论”，指出“田野考古是一种科学的训练”，并强调“科学的方法”的重要性^[16]。1953年夏鼐为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讲授“考古学通论”。1953~1955年，为第二至四届考古训练班讲授“田野考古序论”及“考古发掘”、“田野记录”等课程。1962年5月，为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班同学讲演，内容涉及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世界考古学的最新动态、我国考古学上的主要问题。这些授课、讲演的内容，无不反映夏鼐对考古学方法的重视、倡导。作为新中国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这些努力为新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三、推进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此篇讲演稿，在推进中国考古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

1.夏鼐的这次讲演，具有为起步不久的中国考古学充实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积极意义。

一般认为，以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活动为起点，萌芽和发展于西方、通过调查及发掘遗迹遗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情形的现代考古学逐渐传入中国。1926年李济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史前的遗存，被认为是“我国考古学的破土礼”^[17]。1928年7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内设考古学组；同年10月，史语所开始对安阳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虽然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已逐渐展开，但是当时涉及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著述尚不多见。

1929年11月，傅斯年讲演“考古学的新方法”，他所指“新方法”的人，为瑞典人安特生，“中国人考古的旧方法”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但是“外国人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做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18]。虽然傅斯年在讲演中并未明确提出考古学“新方法”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过程，但是作为当时中国学术界领导人物之一的傅斯年能够明确区别考古学的“旧方法”与“新方法”，并指出“新方法”的意义所在，这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

此后，出现了一些介绍考古学基本知识的出版物。如俞剑华翻译的滨田耕作《考古学通论》1931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促进了当时学人对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方法论等问题的思考。关百益在《考古学大

意》中，主要论述了考古学的定义、范围、方法，他认为考古学“最要之方法，约有八项”，即调查、收买、发掘、保存、陈列、研究、编辑、传播。其中，“发掘”的程序包括测绘、探试、监工、登记、摄影、保管、运输、报告、赔偿、善后；“研究”方法，以物质、名称、年代三者为重心；“编辑”的内容包括叙物、叙事、叙人、说理、考证、补阙、正误；“传播”方法有拓本、绘图、刻板、影照、模型^[19]。葛定华将“考古学之组织”分为三部分，即材料之发掘及记录、编制保存及陈列材料、材料之比较研究并作系统记述^[20]。刘虚谷1934年6月在安阳工作之余撰写了《考古学研究法》，指出“考古工作的三个过程”为调查、发掘、整理，其中“整理”主要包括层位的辨析、形态与文饰^[21]。斯石鹿在《考古学研究法》中，论述了考古学的调查记录法、探查发掘法、资料整理法等^[22]。这几位先生中，只有刘虚谷（即刘燿，后化名尹达）参加殷墟发掘数年，有较多的实践经验。其他几位充其量不过曾涉及金石，并未参与田野考古，所以他们的著述大多仍停留在“介绍”的层面，并未对考古学方法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当然这也跟当时中国考古学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有关。

与之前涉及考古学方法论的著述相比，夏鼐这篇讲演稿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简洁、具体、联系实际。首先，夏鼐不再像之前的很多学人，花费很大的篇幅辨析考古学的定义、考古学与考证古史的联系及区别、考古学与金石学、古器物学等的关系，而是直接以“埃及学”为例，简明扼要地指出他所谈的考古学，是“狭义的考古学”，即“古物学”。其次，用更多具体的实例，说明考古工作各项步骤的实施过程，他将“考古学方法”总结为四步，即考察调查、发掘、整理研究、综合工作，非常清晰地阐明了研究程序。第三，在述及国外考古学状况的同

时，也兼及国内考古学情形，将他所熟悉的国外的科学考古学方法加以介绍，指出当时中国考古学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考虑这些科学考古学的方法在国内是否适应。

针对具体的考古发掘工作（特别是发掘大规模城址），夏鼐非常重视获得考古学资料的“整个情形”。1936年2月6日，夏鼐和吴金鼎午餐时，“随便谈论中国考古的情形”，二人谈到“小屯的发掘，现下虽告一段落，但因仅掘狭沟，未曾整个翻过，将来可以再掘，但那时须将现今深沟中之扰土翻出，始能再翻未扰过之土，工夫加倍不止”^[23]。关于“未曾整个翻过”的说法，李济在总结安阳第四次发掘工作时曾指出，“我们渐渐的发现‘整个的翻’这个计划实行上有免不了的阻碍。‘整个的翻’的主旨是想找建筑的遗址，不能用滚土的方法。换句话讲，一切起出来的土必须移到别处。如此作去，我们就不能不顾虑到我们的经济能力了”，解决的办法是“开工后一礼拜，我们就决定留数米翻一米的计划”，如果“某处我们认为有全翻的必要，仍可全翻”^[24]。夏鼐所指小屯的发掘“未曾整个翻过”确属事实，因为“全翻”只是在“有全翻的必要”的地方进行。在讲演稿中，夏鼐提到“现今规模较大之发掘，常先将整个遗址，加以详细测量，绘成总图”、“即可循墙脚找去，以求整个建筑物之平面图”、“须先将探沟加阔，以便求得建筑物之整个情形”等，表现了他非常重视以“整个”的眼光获取考古资料。

很多时候，学术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夏鼐先是在安阳参加考古实习，后在英国接受专业的、系统的考古学训练，并在多切斯特、埃及、巴勒斯坦等地参加考古发掘。考古学专业知识的不断积累、田野发掘经验的逐渐增加，都使夏鼐于1941年回国后首次学术讲演关于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表现出比之于前人的“进步性”，进而充实了当时中

国考古学的理论及方法。

2.从讲演的内容上看,夏鼐的一些论断具有明显的前瞻性。

如夏鼐谈及“层位学”时,提到“中国史前期中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亦仅适用于河南北部;至于在其文化发源地,两者或许同时发展,惟到达河南北部时,有所先后而已。现下尚无充分材料,以解决此问题”。谈及“标型学”时,他又提出“彩陶文化一名辞,实属不妥,甘肃彩陶可分为数系统,河南之仰韶文化,虽亦有彩陶,然另成一系统,似与甘肃之各系统,皆无关系,这个问题将来须多搜集材料,始能完全解决”。但是就当时中国考古学所搜集的材料来看,尚不能解决夏鼐提出的这两个问题。1945年春,夏鼐在甘肃洮河流域发掘了阳洼湾的两座齐家文化墓葬,据此撰写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一文,为修订中国史前文化相对年代的排序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上的证据。夏鼐认为这次“发掘所得的地层上的证据,可以证明甘肃仰韶文化是应该较齐家文化为早”。在估计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时,他将殷商期作为标准,指出“河南区域的仰韶文化一定比殷商期早过许多,至少是隔离一个黑陶文化期(即龙山文化)。甘肃区域的仰韶文化的年代和在河南区域的大致相差不远。至于齐家文化,不会比西元前二千年早过许多,但是也许是比之晚过许多”^[25]。这些基本结论,都在某些方面证实了夏鼐在讲演中的“推测”。新中国成立后的众多考古发现,更加充实了夏鼐立论的基础。

夏鼐在讲演中还介绍了许多新的考古学技术,如空中摄影技术等,这些新的研究手段在后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都得以采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3.这次讲演与日后夏鼐的考古学理论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

可以看出,他当初提到“层位学”、

“标型学”等概念时,就已经开始思考“考古学文化”问题。他指出“同一文化层,依地形而高低不同,堆积之厚薄亦不均”、“由一小小区域所得之层位学上证据,未必即能应用于大区域”;“如果相邻两地文化不同,但其中有数物相同,则可见两者有交通关系”、“如果两地文化大部分相同,则或同出于一源,或由于相互借用,或由于从此地传播至彼地”。与此同时,夏鼐又提出了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的适用区域、彩陶与仰韶文化的关系等问题。1949年以后,全国各地的考古调查、发掘不断展开,许多新的考古发现骤然涌现,在此背景下,夏鼐及时讨论了什么是考古学文化、怎样确立和命名、考古学文化对于考古学研究的意义何在等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26]。他关于考古学文化问题的探讨,对史前考古学、考古学理论等领域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尤其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使之出现新的局面”^[27]。

夏鼐在讲演稿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涉及到考古学研究目的与任务、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埃及学”可分为埃及古文字学、埃及古物学、埃及古史学三部分,虽然三者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但是“三者关系密切,专攻一种者,对其他二种,亦不能不知”。换句话说,狭义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夏鼐认为皮特里发掘塔尼斯遗址时采用的方法“谨慎周密,堪称为科学的发掘方法,其目标在搜取古代一切遗物或遗迹,以重造古代历史”。“重造古代历史”可以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在考古学的“综合工作”方面,“考古学家亦犹史学家,各人得依其性之所近而有不同之方向”。夏鼐明确指出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即在重行恢复古人之生活概况,使吾人皆能明了人类过去生活”。夏鼐先在燕京大学读社会

注 释

学，后在清华大学读历史学，他对剖析当前社会“情有独钟”，甚至认为攻读中国近代史可以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不过，夏鼐后来选择考古学，虽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却有助于了解“古代社会”。剖析古代社会，也许是夏鼐认为考古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20世纪40年代，夏鼐在四川彭县、甘肃敦煌等地的考古实践活动又为他以后考古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夏鼐后来回忆在敦煌一带的考古经历时说：“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想复原古代人类的生活情况”^[28]。20世纪50年代初，夏鼐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一课，明确提出“学历史一定要了解考古学，文献与实物二者对历史科学就如车之有两轮，缺一不可”^[29]，进一步升华了他之前关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的理论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夏鼐和王仲殊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卷首语，指出考古学和历史学“都属于‘时间’的科学，都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为目标”，考古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考古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而不在于某一个人的单独表现”^[30]。王仲殊也曾评价夏鼐的研究工作，“始终能从具体的遗迹和遗物出发，通过扎扎实实的分析，得出各种可靠的结论，经过归纳，加以提高，进而阐明有关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大问题”^[31]。夏鼐在《考古学通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等著述中阐述的很多考古学理论思想的“关键点”，似乎都可以在1941年的《考古学方法论》讲演稿中找到“出处”。由此可以认为，这篇讲演稿为新中国成立后夏鼐考古学理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总之，《考古学方法论》这篇讲演稿，不管是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还是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1] 《夏鼐日记》（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本文凡涉及具体日期的引文，除另加注释者，均出自《夏鼐日记》。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文集》（上、中、下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夏鼐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4] 如《夏鼐先生论著目录》（载《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夏鼐先生学术活动年表》（载《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出版社，2009年）均未提及夏鼐的此次学术讲演。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文集》（全五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本文所涉及的讲演稿《考古学方法论》收录为第一编“考古学通论”中的第一篇文章，卷末附载的《夏鼐先生学术活动年表》也有所增补。有关该篇讲演稿以及《〈实践论〉与考古工作——学习〈实践论〉的笔记》、《考古学通论讲义》、《关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新资料的增补情况及内容主旨，亦可参见该书《编后记》。
- [6] 董作宾提到“甲骨既尚有遗留，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钜之瑰宝，将为无知之士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并列举“计划挖掘之法”有分区、平起、遽填（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见《安阳发掘报告》第1册第5、6页，1929年12月）。董作宾后来在《殷墟文字甲篇自序》中仍指出，他排列甲骨文的顺序，“并不是分期或分类，为的显示这一批材料是经过科学发掘工作，所以依照着他们出土的先后次序排列的”（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篇自序》，《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第228页，1949年12月）。
- [7] 李济：《安阳》，见《李济文集》卷二第3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8] 夏鼐初抵伦敦解决入学问题的主要焦点在于是否学习中国考古学,具体可参见《夏鼐日记》1935年9月至1936年5月的相关条目。
- [9] 此信写于1936年4月11日,并全文附于1936年4月12日日记之后。在《夏鼐日记》正式出版之前,王世民将此信整理并注解,以《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为题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 [10]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第6页,1928年10月。
- [11] 李济:《现代考古学与殷墟发掘》,见《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第406页,1930年12月。李济在1936年《田野考古报告》创刊时进一步强调“田野考古工作”是“一种真正的学术”,并且需要“科学的训练”,“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给史学家的采用”(李济:《编辑大旨》,见《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第1页,1936年8月)。
- [12] 《傅斯年致夏鼐》(1936年5月8日)。此信以“附录二:傅斯年先生复信”为题与《夏鼐陈请梅贻琦校长准予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一同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 [13] 在此之前,夏鼐对吴金鼎《田野考古学大纲》(草稿)评价也不高,他认为此稿“大致依照皮特里诸氏之说,实则此事本凭经验,经验未多,空谈乱抄,并无益处,但又不好意思明说”,见《夏鼐日记》卷二第112页,1936年6月6日。
- [14] 夏鼐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对小屯发掘的不满意。1936年8月他在梅登堡遗址进行田野考古实习时,“想起安阳小屯的发掘来。不久的将来,恐便有再加发掘的必要。土人的盗掘坑之外,又加上中研院的深坑,真够麻烦人了”(见《夏鼐日记》卷二第66页,1936年8月27日)。李济至英国访问期间,有一次谈话中,夏鼐“露出不满意小屯发掘的方法,李先生仰卧着,两眼直视天花板,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又叹口气说:‘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见《夏鼐日记》卷二第95页,1937年2月22日)。
- [15] 李济在总结安阳前七次的发掘活动时提到,“安阳发掘虽不以殷墟为限,然而这些次的活动却专重殷墟,事实上并以出甲骨文字之小屯为工作的中心”(李济:《编后语》,见《安阳发掘报告》第4册第729页,1933年6月)。
- [16] 夏鼐:《田野考古序论——在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演摘录》,《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4期。
- [17] 郑师许:《我国考古事业之回顾》,《现代》第6卷第3期第48页,1935年4月。
- [18] 傅斯年讲述、王培棠笔记:《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上海)第1期,1930年12月。
- [19] 关百益讲述、赵惜时笔记:《考古学大意》,《河南博物馆馆刊》第1、2期,1936年。
- [20] 葛定华:《考古学之辅助科学与研究方法》,《河南大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34年。
- [21] 刘虚谷:《考古学研究法》,《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新第96期,1934年。
- [22] 斯石鹿:《考古学研究法》,《艺风》第2卷第12期,1934年。
- [23] 《夏鼐日记》卷二第10页,1936年2月6日。
- [24]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见《安阳发掘报告》第4册第562页,1933年6月。
- [25] 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中国考古学报》第3册,1948年5月。
- [26]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1961年,夏鼐又撰写了《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该文曾打印若干份以供同仁交流,但未正式发表,后收入《夏鼐文集》。
- [27] 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纪念夏鼐先生诞生90周年》,《考古》2000年第3期。
- [28] 夏鼐:《敦煌考古漫记》第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 [29] 夏鼐:《考古学通论》,见《考古学研究》(一)第22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 [30]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卷首语”第1~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 [31] 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

(责任编辑 黄卫东)